

一个学科或流派,使用哪一种理论或方法,可能都是次要的。以研究对象为中心,以解决问题为目的,跨学科、多视角地展开研究,才是医学社会史的精髓和希望所在。

## 古代城市形态研究的两个维度<sup>\*</sup>

陕西师范大学西北历史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院教授 张 萍

古代城市形态研究是城市史研究的一个方向,也是历史城市地理学、考古学、城市建筑学、城市规划学等学科关注较多的领域,属名副其实学科交叉的产物。伴随人类认识世界水平的提高,对于自然与人文现象的认知更加多元,学术研究中交叉学科的探讨逐渐加深,古代城市形态的研究也越来越受到重视。但是古代城市形态研究究竟该如何进行?历史学者进行此项研究的价值取向与研究意义在哪里?诸如此类问题都亟待解决。

### 一、中国古代城市形态研究的群体及价值

如果从中国城市史的角度来考察古代城市形态研究,显然可以看出,“城市形态”一词用于史学研究是晚近的事情,使用频率并不高。20世纪90年代以前,基本看不到这样的名词。然而,就目前学术界对于中国古代城市形态的研究来看,其中又不乏与之相关的研究成果,这些成果归纳起来主要来源于三个研究群体:考古、历史、城市规划与建筑学者。<sup>①</sup>

考古工作者关注城市形态是基于中国考古学的研究进展,众多古城的发现与发掘迫切需要学术界对这些城址进行解读。据不完全统计,至21世纪初,经考古调查与发掘的中国古代城址已达2000余座,其中许多重要城址历经数次调查和多年连续发掘。<sup>②</sup>先秦时期的城市状貌依据文献记载已很难复原,但是一系列城址的发现,为学者提供了大量可视性研究资料,使研究者能够比较清晰地看到这些城市的本来面目,为城市形态定位提供了实测基础。因此,中国近世考古学的发展是促进中国城市形态研究的主要力量,贡献极大。历史学者从事此项研究多数集中在历史地理专业。中国历史地理学奠基人之一的侯仁之,其博士论文即为《北平历史地理》,开辟了中国历史地理学有关城市研究的先河。<sup>③</sup>之后侯仁之主编了《北京历史地图集》,<sup>④</sup>史念海主编了《西安历史地图集》。<sup>⑤</sup>学术界对于西安、洛阳、成都、扬州、南京等城市的研究不断增多,历史地理学者在关注城市发展环境基础的同时,有关城市内部空间结构成为另一重要研究对象。城市规划与建筑学界需要对中国古代城市规划及建设的历史进行总结,这既是学科发展的需要,也是城市规划过程中旧城保护的客观需求。董鉴泓主编的《中国城市建设史》即为其中的代表作,系统地讨论了中国城市营建史,成为城市规划专业的教科书。<sup>⑥</sup>

<sup>\*</sup> 本文为国家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项目“碑记所见西北地区城镇形态演变与城镇社会变迁(1368—1911)”(项目号14AZS011)的前期成果。

<sup>①</sup> 成一农:《中国古代地方城市形态研究现状评述》,《中国史研究》2010年第1期。

<sup>②</sup> 曲英杰:《古代城市》,北京:文物出版社,2003年,第4页。

<sup>③</sup> 侯仁之:《北平历史地理》,邓辉等译,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3年。

<sup>④</sup> 侯仁之主编:《北京历史地图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7年。

<sup>⑤</sup> 史念海主编:《西安历史地图集》,西安:西安地图出版社,1996年。

<sup>⑥</sup> 董鉴泓主编:《中国城市建设史》,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2年。

但是,如果我们将三个群体关于中国古代城市形态的研究进行比较,又会发现,其学科关注点与所要解决的问题存在着明显差异。考古学者对于城市形态的研究关注时代较早,从先秦至隋唐比较集中,利用城址的考古学挖掘,填补以往文献记载之不足。因此,这些成果对于我们复原中古以前城市形态特征大有裨益。历史地理学者主要围绕地理学的地域空间格局展开分析,更多关注的是城市结构与环境的关系,诸如城市内部空间结构的组成要素有哪些,这些要素以何种形态展现在当地的自然景观中,也就是其空间分布是怎样的。城市规划与建筑学界主要是从中国古代城市规划与建设的历史中总结经验,研究历史上城市规划的思想来源、技术手段,城市发展与进步的原动力。纵观以上研究,学者虽然从各自的专业领域对于中国古代城市形态的方方面面进行了讨论,但其本质与今天我们所说的“城市形态”研究还是存在一定距离。

真正将“城市形态”概念引入中国古代城市研究是近年来的事情,台湾学者章生道较早做了尝试,他在《城治的形态与结构研究》<sup>①</sup>一文中使用“城市形态”一词,虽然文章不长,但对于城市结构与形态的研究方法具有启发意义。北京大学李孝聪的《唐宋运河城市城址选择与城市形态的研究》则正式以“城市形态”为题,指出在中国古代城市研究中,除了应该关注城市的选址问题,也应该关注当时的礼法制度对于城市外在形态与城市内部空间结构的塑造,这是中国大陆学者较早进行古代城市形态研究的典型案例。<sup>②</sup>此后,关于中国古代城市形态研究的论著不断产生,作者多自觉使用“城市形态”一词,并运用到中国古代城市的具体案例分析中去。<sup>③</sup>

## 二、城市形态的概念、起源及研究意义

如果从学科发展的角度来看,城市形态学源起于西方,主要是将生物学中的形态学概念引入到城市研究中。众所周知,形态学在自然科学中占有重要地位,达尔文曾说,形态学是“博物学的灵魂”。<sup>④</sup>

形态学最初只用于生物学研究,研究植物的外形、生长与内在结构的关系。20世纪20年代初,随着城市研究的深入和学科交叉的拓展,地理学与人文科学的学者将形态学引入城市的研究范畴,城市形态学概念正式产生。这一思潮首先在德国发源,后在欧洲广泛发展起来。

将形态学引入城市研究,其首要目的在于利用形态学概念的内涵,将城市视为一有机体加以观察,从而了解城市这一有机体是如何生长的,促进或制约其生长的机制是什么,进而建立一套对城市发展加以分析的理论。在研究内容上,“逻辑”的内涵属性与“表现”的外延共同构成了城市形态的整体观,其逻辑基础是肯定一定的内在结构和深层特征是生成一定城市外形的基本力量,它利用与环境、社会、经济、文化等因素有关的历史主义眼光来看待城市的发展与演进,并且研究城市结构与外形的继承与变异关系。其中,最具代表的人物是德国地理学家康泽恩(M. R. G. Conzen)。正是由于他的倡导与努力,才初步形成了城市形态学的理论基础。其

① 施坚雅主编:《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叶光庭等译,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84页。

② 李孝聪:《唐宋运河城市城址选择与城市形态的研究》,侯仁之主编:《环境变迁研究》,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153页。

③ 相关成果如成一农:《古代城市形态研究方法新探》,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鲁西奇:《城墙内外:古代汉水流域城市的形态与空间结构》,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

④ 达尔文:《物种起源》,苗德岁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3年,第434页。

集大成之作是完成于1960年的《城镇平面格局分析：诺森伯兰郡安尼克案例研究》一书。<sup>①</sup>在这部著作中，康泽恩运用“平面单元”的概念，确定“城市边缘带”，使用“租地权周期”的思想，运用英国历史地理学研究方法，进行地块变化周期分析。值得一提的是，他的一整套研究方法的出发点都是由现存的城镇形态追溯至塑造这些形态的原动力。20世纪80年代，英国伯明翰大学地理系成立了城市形态研究组，继承和发展了康泽恩的思想，并形成康泽恩城市形态学派，是目前这一领域最为活跃的学术组织之一。当然，关于城市形态研究内容在西方国家还有很多不同的流派，如环境学派、行为主义、人文主义的研究方法等，均对我们开阔学术思路、增加对城市的理解颇有助益。

### 三、古代城市形态研究的维度

从城市形态学的发展历史来看，它主要用于城市规划。但从城市形态形成的角度来说，它又是一个历史的过程，今天的城市结构都是经过历史的发展而来，城市形态的变迁也与社会制度、文化观念、经济过程等要素相联系。针对城市形态历史的考察，可以帮助我们了解附着于城市物质形态之上的国家政治、制度、经济与文化的深层内涵，对于我们更好地理解中国古代城市发展史是有意义的，当然，这一研究必须建立在对城市形态概念与内涵的充分理解基础之上。

以今天的学科定义，城市形态主要指城市各组成部分的空间结构和形式。如果进一步分析，还应包含两层含义：一为城市内部形态，指城市的建成范围内各种用地的形状和布局，以及城市建筑空间组织形式；二为城市总形态，即中心城市和相邻城镇的布局。<sup>②</sup>那么，按照以上理解，中国古代城市形态研究至少也应该包含以上两个维度。

（一）城市内部结构性变迁及其影响因素研究。中国古代城市多伴有城墙结构，城墙成为城镇的重要标识与外在表象。以往城市形态研究多关注城墙的规模、形状、城门数量乃至城墙建筑材料的选择。虽然这些要素都属城市形态的组成部分，但仅此研究还相当不够。城市形态的演变往往表现出城市结构的改变，这种改变在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非常突出。如中国史前时期就有环壕聚落，<sup>③</sup>汉代城市出现“子城”结构。<sup>④</sup>魏晋至隋唐时期城市形态更加复杂，明清时期中国城镇发展达到高峰期，城镇状貌多姿多彩，城镇形态的改变也表现出前所未有的频繁与多样化。汉水流域的城镇发展出围墙内的城镇与无城墙的“河街”双重结构。<sup>⑤</sup>西北地区复城结构的城镇较多。<sup>⑥</sup>这种旧城区扩张与新城区的发展，是有关中国古代城市内部空间结构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再者，对于中国古代城市内部空间结构的研究，也离不开具体要素的分析，如寺庙、

① 康泽恩：《城镇平面格局分析：诺森伯兰郡安尼克案例研究》，宋峰等译，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1年。

② 《中国大百科全书·地理学》，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0年，第43页。

③ 钱耀鹏：《略论史前时期的环壕聚落》，西北大学文博学院编：《考古文物研究——纪念西北大学考古专业成立四十周年文集（1956—1996）》，西安：三秦出版社，1996年，第136—144页。

④ 参见徐苹芳：《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帛画“城邑图”及其有关问题》，《简帛研究》第1辑，北京：法律出版社，1993年，第111页；周长山：《汉代城市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42页。

⑤ 鲁西奇：《山城及其河街：明清时期郾阳府、县城的形态与空间结构》，陕西师范大学西北历史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编：《历史环境与文明演进——2004年历史地理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第538—559页。

⑥ 张萍：《城墙内的商业景观：明清西北城镇市场形态及城镇格局的演变》，《民族研究》2013年第3期。

衙署、文化与商业中心等，这些要素的变动往往反映制度与社会的变迁。以唐长安城百官家庙为例，它一方面反映唐王朝对官员建庙制度规定严格，另一方面也与唐王朝笼络藩镇等政治势力的手段相联系，体现出深刻的制度背景。<sup>①</sup>

此外，中国传统城镇大多受行政指向性制约，除少量市镇等经济型城镇，多数属政权的中心，这些标示着国家权力中心的城镇，在建设过程中不仅仅体现出当地的经济实力，更多地与当地政治、军事、文化乃至民族关系息息相关。制度的张力是促进城市形态改变的重要因素，同时不同历史时期城市形态的复杂演变过程，也体现出各时期的国家、社会、民族等多重关系，这些研究也是城市内部空间结构演变的重要内容。

（二）古代城市形态与地域经济关系的研究。城市形态不仅是就某个单体城市的形状、规模、内部结构而言，同时它还具有一定的功能性，包括城市与周边城镇的关系、城镇体系、城镇地域结构等问题。

城市形态是多元的，这一点决定了它与周围地区城镇具有一定联系，它既受城市周边环境的影响，也受一定时期内政治与制度条件的制约。汉代长安城作为首都，其基本构成被认为是“由长安及十个卫星城（陵县）所组成的大长安”。<sup>②</sup> 明清西北地区的商业中心由西安、三原、泾阳三地平分。这种地理格局既是由城墙规模所限形成的商业中心的离散，也是政治与军事制度影响下的城镇地域分异的表现。<sup>③</sup> 以往我们关注城镇的地域分异问题，多强调它是工业化以后城市发展的新格局，事实上，在中国传统社会同样存在这一现象，只不过，它不一定是受城市地域范围限定，有时还受城墙体系等其他条件制约，这是传统城市扩张模式的一个体现。

城市与周围地区有着密切的经济联系，这种联系常常超出城市化的范围。关于中国古代城乡关系的研究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热点。牟复礼在研究明代南京城市与旷野的划分时曾指出，大量政府高官住在南京城外的宅邸，中国古代的“城确实没有把城市集中区与旷野划分开来”。<sup>④</sup> 因此，我们说城市建成区或城市化地区所反映的城市内涵并不是行政意义上的城市，而是实际景观上的城市，这样的城市地域边界经常处于变动状态，研究这种变动是解析中国古代城乡关系的切入点，也是城市形态研究上的重要内容之一。

总之，城市是人类文明活动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是政治活动的中心、经济运作的平台、文化传播的摇篮、精英决策的舞台，其所承载的历史内涵相当丰富，对中国古代城市形态的研究意义也十分深远。以上分析只是强调城市形态研究的内容把握，希望我们的研究能够从传统的城市外在表象研究中走出来，更多关注城市各空间组成部分的形成与变迁，如城市空间用地的变动过程、城市内部各要素作为历史符号所承载的特定内容、城市建筑形式转换的历史价值、城市地域结构的形成特征等。当然，传统时期的城市聚落比之工业革命以后的城市内容要简单得多，它们也不像现代城市那样被“分解”得过分细密，在制约因素上如生态资源、经济与技术水平、功能需要、社会文化等方面也都非常直接，因而它往往更真实地反映人类生活的现实与理想，较少受到外在目的和价值的侵蚀，所以这些外在形态的演变相对要简单，研究方法也有自身的特点，这一点需要我们在具体的研究中去有效地把握。

① 张萍：《唐长安官、私庙制及庙堂的地理分布》，《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1年第4期。

② 周振鹤：《西汉县城特殊职能探讨》，《周振鹤自选集》，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8页。

③ 张萍、杨蕊：《制度与空间：明清西北城镇体系的多元建构与经济中心的成长——以西安、三原、泾阳为中心的考察》，《人文杂志》2013年第8期。

④ 牟复礼：《元末明初时期南京的变迁》，施坚雅主编：《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第152页。